

## 重振工業更勝社區經濟

馮以超 (27-06-2002)

香港社會民主基金在去年十月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名為『廿一世紀的香港：經濟、社會與政治的可持續發展』的意見書(詳見該基金網頁：

[www.socialdemocracy.org.hk](http://www.socialdemocracy.org.hk))，並與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討論過有關建議。今年政府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了『本土經濟』，並向傳媒表示其概念源於社會民主基金的『二元經濟』，目的為解決低技術的失業人口問題。的確，在關注低技術工人失業問題上，梁錦松與社會民主基金是一致的。但綜觀目前政府推出的種種措施，以至部分民間團體倡議的「本土文化經濟」和其他社區經濟活動，都與社會民主基金原本的構思相距甚遠，就是連傳媒和公眾也往往未能掌握到這些概念。

『二元經濟』絕非甚麼新事物，早在八十年代不少發達提出這概念，甚至在教科書內亦有提到。社會民主基金的曾澍基教授亦早在一九八八年，已將有關概念引用到香港的情況，指出在一國兩制的特殊情況下，低技術動勞力單向流入香港，形成「困籠經濟」。事實上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，香港經濟結構出現變化，漸發展成為二元經濟。若香港沿著目前的老路走下去，一部分是超級曼哈頓，另一部分則是第三世界化。我最擔心的是香港出現結構性失業問題，失業上升、貧富懸殊、社會不穩。

現在社會民主基金基於曾教授的構思，提出發展優化的二元經濟的建議，指出香港應該發展高增值低就業的第一元行業，以創新、高產值、高科技行業作為火車頭，但同時亦必須扶助第二元低增值但高就業的勞動密集行業，擅用本港既有優勢，增強創匯能力或發展替代現時進出的商品或服務的行業，創造『香港製造』的品牌。既須維持一貫外向型的經濟，亦須重視本港與內地市場。我們認為重振本港工業，不單可以創造大量就業機會，並可推動其他行業一環扣一環地發展。

反觀目前由民政事務總署統籌的所謂『本土經濟』，搞藝墟，擺地攤，只是在社區層面推動的『社區經濟』，充其量如梁錦松所說是社區經濟加旅遊。這種塘水滾塘魚的做法，既推動不了經濟發展，也無助於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。也許阿松認為，目前經濟低迷，消費信心不足，只要刺激內部消費，又或採取一些短期措施，紓緩目前失業壓力，當經濟好轉，便可徹底解決失業問題。但我們必須認清，當前的經濟轉型與過往大大不同。

八十年代開始，內地正處於開放改革初期，促使本港工業不斷北移，但內地的運輸、金融、通訊業的發展遠落後於貿易發展，而其中人才、制度、政策等軟件配套更為落後。香港因而充份發揮了作為亞太地區貿易、金融、航運、通訊中心的優勢，促使相關服務行業迅速發展，令香港經濟成功轉型，也吸納了大量就業人



口，從而創造了一個龐大的內部消費市場。然而，隨著內地開放改革深化，香港原有的優勢日漸減弱。加上全球經濟一體化，通訊科技日益進步，促使香港邁向知識型經濟，相關服務行業的就業機會也北移，除製造業外，就連運輸、倉儲、保險、銀行押匯、通訊等行業也出現『空洞化』，職位數日日減，造成內部消費萎縮。金融風暴後，以地產業為火車頭的泡沫經濟爆破，失業問題更趨嚴重。

高增值的第一元經濟的就業人口相當有限，『滴漏效應』不顯著，不可能帶動第二元經濟蓬勃發展及提供很多就業機會。再加上本港低技術、低文化的勞動人口，難於移入內地；但每年卻有五萬多相對教育、技術水平較低的人口移入，這種單向的人口移動，令失業問題進一步激化。即使第一元經濟得以發展，經濟情況好轉，日後也大可能同時出現經濟增長與失業率上升的情況。

因此，我們不單要留住尚未北移的工業，亦要提供誘因與政策，讓已北移的廠家重新把部分高產值工序回流返港，或令他們於外地增設分廠時，優先考慮返港。這當然存在不少困難，但卻絕非天荒夜譚。例如目前急需解決的是經廿年工業北移後的人才斷層問題。而且不少工業是存在著上中下游一環扣一環的縱向或同行橫向的『群居效應』，政府從中協調與工業用地規劃，也是很重要的。若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就緊密經濟聯繫的『零關稅』儘快達成協議。肯定對促使不少行業決定回流起關鍵性作用。

此外，政府必須提供優惠，吸納內地與海外企業來港設廠。當鄰近地區與國家，以至歐美各國紛紛提供優惠政策，推動一些策略性發展經濟的行業，特區政府甚麼也不幹，便等於與這些地區進行『不公平』競爭，最終註定失敗。若今天還高唱『積極不干預政策』，只是官員無知、無能的遮丑布。

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改變『搞工業是死路一條』的心態。決策官員要改，市民大眾要改，年青人不肯入行的心態更要改。目前三十多個商會就發地這樣一個計劃，當我們數月前推動這項工作時，不少朋友與傳媒均以爲我們是開玩笑或僅是書生論政，現在幾份重視經濟新聞的報章也開始作專題系列報導，實在是可喜的現象。

(本文節錄部分已刊載於 2002 年 6 月 27 日之《明報》。)